

我心中的十位人物：描绘中国知名教育家的肖像^①

Ten Lives in Mine: Creating Portraits of Influential Chinese Educators

许美德 (Ruth Hayhoe)

华东师范大学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从当代世界的时代背景以及作者的求学经历与叙事转向出发，解释作者为什么会写这样一篇论文。接着，本文叙述了作者近几年来描绘十位中国知名教育家的肖像的整个过程。最后，作者探讨了在描绘知名教育家的肖像的过程中，获得了哪些方法论意义上的经验。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reasons for writing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begins with a depiction of present global situation and her own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academic turn of narrative. After this, the author describes the whole process of creating portraits of ten influential Chinese educators. In the end,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lessons that have been learned during the course of creating portraits.

① 本文是许美德教授即将出版的一部教育叙事著作的前言，所以行文中会出现“本书”字样。——译者注

导 言

本文的内容乃是介绍我在描述中国十位知名教育家的生活故事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因此它是一篇关于研究方法的文章。在其中，我特别讨论了对另一种文化语境中的教师生活与思想进行叙事研究需要注意哪些事项。除此之外，本文谈论了此项生活叙事研究的目的。作为一个文明体系，中国在未来全球社会无疑将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此项生活叙事研究则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这一文明体系。

为了说明本文的写作背景（context），同时也为了解释我为什么会写这篇文章，我打算从描述当今世界所处的历史时刻开始。联合国曾用“文明间的对话”（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来描述这一时刻，同样，本项研究之所以能够形成，以及本项研究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也是来源于“文明间的对话”。接着，我将叙述自己的学术旅程如何将我引向了叙事方法，并反思叙事方法的意义。最后我会探讨本项研究的主题，与大家一起分享在描绘这些知名教育家的生活肖像时，我究竟学到了什么。

为什么会以“我心中的十位人物”作为标题？这里，我必须开诚布公地指出，这一想法其实是从我的老师格雷丝·艾尔文博士（她曾深深影响过我）那里借来的。她写过一本书，名叫《我心中的三个人》（Irwin, 1986），在书中，她讲述了她的父亲、她的兄弟和她敬爱的牧师这三个人的故事。我曾花费好几年的时间研究十位中国知名教育家的生活故事，包括尽可能周详地采访他们当中的每个人，收集他们的著作，以及追忆他们的大学经历，但是，当我最终决定要为即将出版的专著撰写一篇文章来介绍他们时，我却陷入了不知从何说起的尴尬境地。我能将他们的生活故事讲述清楚吗？要知道，他们不仅有着深厚的教育理念，而且还为现代中国的焕然一新作出了贡献。经过无数次的私人交往与访谈，再加上通读他们的著作，我对他们的一生已有了大致的了解，但仍有许多事情是我尚未知晓的。

我很清楚,无论怎样我都不适合作为他们的传记作者,原因很简单,我并没有掌握足够的信息和知识。然而,我可以将自己看成是他们的“肖像”作者,根据我所知道的情形,把他们的面貌与风度勾勒出来,毕竟我与他们在各种场合中曾有过多年的交往,何况我还访谈过他们的,面对面地坐着倾听他们的讲述。我会通过记忆,并以他们的作品作为佐证,力争给他们的“肖像”涂上“颜色”,使之充满“质感”,从而使得读者看过他们“肖像”之后,能够或多或少地领会他们内心世界的价值观与信念——正是这些内在的价值观与信念使得他们的人生充满了意义与目的。因此,本文不是将“他们的生活与理论”当做客观的考察对象,并加以一点主观色彩都不带的冷静分析,相反,本文乃是叙述“我心目中的他们的生活”。我与他们有过交往,而我的生活也曾经被他们所树立的榜样改变了。

一、文明间的对话

人类步入 21 世纪后,联合国曾将 2001 年定为“文明间的对话”年。然而,具有讽刺意味且令人痛心的是,正是在这一年,纽约发生了“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联合国的目的是为了激励人们“关注人类的文化和精神生活,维护人类的独立及其丰富的多样性”(Hayhoe & Pan, 2001: 1)。

或许我们会将“文明间的对话”这一呼吁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1991 年秋,苏联解体使得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社会科学的基础框架。受这一框架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在理解现代历史进程以及现代社会的多样性时,往往优先考虑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而对于精神或宗教方面的特征则关注不够。就我所属的比较教育研究领域而言,确实存在这种情形,人们喜欢将“社会”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与之相联系,“经济”也被区分为两种状况,即“发达”与“发展中”,以此框架为基础的比较研究便热衷于去分析教育对于“发展”作出了怎样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一种

内在的理论动力乃是源于欧洲启蒙思想及其重要的历史发展轨迹（假设）。正是在这类思想的作用下，人们常常会根据对于现代化进程的阻碍或支持程度，来评价其他文明体系的教育实践。

紧接着，冷战结束又引发了一系列新对抗，对此，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曾以“文明的冲突”这一引人注目的措辞作过归纳。亨廷顿呼吁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其他文明体系的宗教与哲学观念，以及在这些文明体系中生存的人们思考自身利益的方式”（Huntington, 1993: 49）。他认为，西方能否做到这一点，对于维持自身在全球社会中的领导地位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与亨廷顿不同，其他人则认为，这是向非西方文明学习的好机会，进而摸索西方人怎样才能超越启蒙遗产所提供的（文明）模式。

就后一类观点而言，最著名的言论之一是由另一位哈佛教授杜维明提出来的。在一篇思想深刻的文章中，杜认为，启蒙运动的核心价值观包括“自由”、“平等”、“人权”、“个体的尊严”、“尊重私人性”（privacy）、“民治以及法治”（Wei-Ming, 1998: 3-21）。接着，杜维明又指出了启蒙运动的黑暗一面，即进步、理性与个人主义日益演变成了以自我利益为中心、扩张主义、支配、操纵与控制。他觉得必须重新思考启蒙遗产，扩充其视野范围，深化其道德意识，进而对其内在的局限性实施创造性的改造。他希望在将来，人们能将启蒙价值观改造成一种能给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带来福音的全球观念。

杜维明的著作大大丰富了一个世纪以来不断在发展的西语儒家思想文献。不幸的是，直到今天，人们依旧更倾向于认为这些文献所代表的乃是一种保存、整理古典知识的学术训练，而不是把它们看成是西方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社会科学界之所以会忽视儒学作为精神或宗教知识的价值，其中的一个原因在前文已经分析过。很少有人愿意倾听来自其他文明的精神教诲，甚至对待西方自己的精神遗产也是这种态度，认为这些精神遗产在现代化的世俗趋势冲击下早已消失殆尽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因来源于20世纪儒家思想与理念在中国本国的命运。

自1919年五四运动（常被描述成“中国的启蒙运动”）以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现代改革者，均将儒学看成是现代化事业的主要障碍。之后的几十年里，人们一直在批判儒学，认为它强调等级划分，腐朽僵化，因循守旧，而且压制创造性。但是，进入20世纪60、70年代，随着东亚社会比如日本、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腾飞，这类批判突然又调转方向了，纷纷开始纠正以前的看法，其中引人注目的一种观点认为，正是儒学给东亚人带来了目标、纪律与技能等现代化进程所必不可少的基本动力（Vogel, 1991）。

著名的汉学家狄百瑞指出，上述两类儒学观均没有准确把握被中国人广为接受、流传时间长达千年甚至更久的儒家教育模式的真正特征与不朽价值。在狄百瑞看来，传统中国政府很少过问地方教育，而是将自己限定在控制科举考试上，并用它来挑选执行统治的学者精英，地方一级的教育是按照新儒家有关“正当人类秩序”（proper human order）的设想运行的，其基础乃是这样一些价值观念，包括自主、个体责任、家庭和睦和地方自治，等等。由宋朝新儒家学者朱熹于12世纪分门别类整理并加以注解的“四书五经”一直使用到了20世纪初期。

狄百瑞就此追问道，“四书五经”的长期流传是否可以说明这些典籍的文化价值呢？接着，狄百瑞又探讨了19世纪中国和日本学者博采众长、多元发展的学术倾向，进而指出在这个关键的转折世纪，中日两国的学者远没有压制对于新观念的开放性。相反，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核心课程为个体自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此基础可以进入许多不同的专业领域，并从西方那里获取现代化事业不可或缺的新式科学知识。

儒学本质上乃是一种“为己之学”。“朱熹的《四书集注》能使个体养成一种自尊、自重的观念，而不是荒废在任何短期的功利目的上；使个体从世界出发，而不是受制于某个国家或派别；使个体知道如何培养自己的能力，以便承担起社会责任——这同时也是学以致用

所带来的欢乐。在这里，能力与责任乃是相辅相成的，一点也不矛盾。不仅如此，它还提倡一种师生之间自由对话的教育过程，并鼓励提出不同的关于传统教义的理解。”（de Bary, 1996: 33）

狄百瑞所说的这些话为我提供了一把钥匙，可以用来打开我正在研究的十位教育家的内心世界，并寻找其内在动力的秘密。为什么意识到这一点要等如此之久？为什么 20 年前当我踏上研究 20 世纪中国教育的学术征程时没有发现这一点？简单地讲，这是由于我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忘却”（unlearning）攻读博士期间学过的那些研究方法，这些方法正是根据现代化追求建构起来的，它支配着当时的社会科学，所以我只有先学它，才可以去探索。

二、学习与忘却之旅

我所取得的第一个学位是在西方古典研究领域。我阅读过许多欧洲传统的用希腊文及拉丁文写成的哲学、历史与文学著作，包括柏拉图的《理想国》，苏格拉底的《申辩》，古希腊悲剧作品，希罗多德、修西底斯以及品达等古希腊经典作家的著作。至于拉丁文著作，则有维吉尔的《埃涅伊德》、荷马的《奥德赛》、塔西陀的《历史》以及西塞罗的散文作品，等等。我相信，正是由于我熟悉如此丰富的欧洲古典传统，才使得我 21 岁来到香港时会对中国的古典文化感兴趣。虽然在正式的研究过程中，我主要是在考察现代中国，但我确实钻研过一些中国古典著作，而原版的儒学经典“四书”我至少通读过两遍。

但是，在研究生阶段，我转移到了比较教育领域，而我的研究方法则是由客观性和价值中立这两点原则构成。我在伦敦大学时的博士生导师布莱恩·赫尔姆斯教授在比较教育领域曾推出一套“问题研究法”（problem approach），这两点原则恰恰是其重要构成要素。这套方法在当时堪称创新之举，它克服了实证主义社会科学某些最糟糕的弊端，尤其是忽视了探讨价值及其在现代教育发展中的作用。然而，

这套方法主张一种两元论哲学，将学术研究看成是一种中立的活动，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批判性地分析价值在现代化中的功能，但是，这套方法既不能对价值的内在本质作出评价，又无法以主流价值为基础，为将来提出理想。赫尔姆斯的问题研究法在当时曾被广泛地运用于中国教育研究文献中，这些文献倾向于使用“现代化”和（或）“社会主义建设”之类的宏观社会学范畴来衡量中国的教育发展，并且对政治经济体制以及历代政治派别治理国家的政策路线给予了最大程度的关注。

或许因为我早年所受的西方古典教育以及对于中国古典哲学的强烈兴趣，我发现自己对于赫尔姆斯的方法越来越感到不满，所以，在我的博士后研究中，我采取了一种价值公开的研究方法，该方法是由世界范围内那些致力于“世界秩序模式计划”（World Order Models Project）的激进学者提出来的。这些学者主张学术应直接承担起一定的道德责任，并将自己的使命界定成“为全球社会勾画最美好的未来”。他们的努力使这样一种理论框架成为可能，其特征是向多元文明及文化遗产开放，并以它们作为价值的源泉，从而区别于那种狭隘的启蒙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以我考察中国高等教育的宗旨为例，在我研究中国大学与西方各国大学的关系时，这一方法便给我提供了帮助，使我可以描绘出一幅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历史图景。凭借这一典型的关系模式，人们还可以评价国际组织比如世界银行以及那些重要的西方国家的援助机构所实施的各类国际或双边教育发展项目（Hayhoe, 1989）。

在我的研究工作中曾经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当我收集中国教育发展的数据时，我越来越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内在的主体性而不是所谓的客观性上^①。当中国的大门向西方学者敞开时，人们便可以实施访谈，从而更进一步地考察中国大学的管理者和学者如何理解自己所属学校及社会的变革过程，而不是简单地拿着一副外在的理论透

^① 关于这一点，我在自传中作过详细的描述（参见 Hayhoe, 2004：第3章）。

镜来理解他们。每年我都会到中国旅行4—6周，访问了20—25所大学，倾听过副校长、学生处处长、科研管理人员和教授讲述各自所在的大学是怎样响应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我发现，不同的大学和地域之间存在着非常有意思的差别，并逐渐了解到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个性（personality），因此与国家政策所期望的方式略有差别。除此之外，我还发现，大多数教授一辈子都是在一所大学里任教，每个人都保留了一段可观的大学回忆——由在大学中工作的个体的私人记忆构成的大学回忆。

“文革”结束之后的大学史写作乃是考察中国高等教育如何摆脱自1952年以来苏联模式的束缚，进而形成自身的认同（identity），同时治愈“文革”动乱期间所造成的创伤。在国家改革开放的框架下，大学的自主性日益增强。通过立足自身独特的历史经验和地域条件，分析把握所处环境中的机遇，大学陆续找到了自己的改革道路（Rayhoe, 1999: 149-224）。

然而，作为一名外国人，有一段时期，当我指名道姓想去访问哪个人时，心里总会觉得不自在，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文革”时期都曾有过挫折的经历。直到1990年代后期，我才觉得可以集中精力开始进行个人访谈，去了解十位知名教育家的生活经历。这十位教育家当中的许多人都曾和我在联合培养博士以及合作开展研究的过程中做过多年的同事。

不久，我便惊奇地发现，五四运动以来被公众认为是现代化阻碍并在“文革”时期受到猛烈批判的儒家传统竟然是这些教育家一个世纪里安身立命所必不可少的根基。我当时无法理解这一事实，因为中国国内当代教育文献中盛行的观点对我的影响实在是太强烈了，这些文献全然没有考虑儒家思想的作用，以为它与当代教育没有一点关联，更糟糕的是，有的文献依旧认为儒家思想乃是进步改革的障碍。

那么，我该怎样解释他们的生活故事与儒家传统的关系？又该如何理解他们在中国一个世纪的剧烈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变迁过程中从事教育思考与实践的方式？面对他们作为伟大文明的继承者所经历过

的变化，以及我自己对于中国的理解（同样也是变化的），何种方法能让我以一种互动的方式来处理这两个方面？我开始调整自己的研究方法，幸运的是，后来在接触叙事方法文献的过程中，我发现叙事可以帮助我实现这种方法论调整。我通过实际接触中国社会积累起来的体会竟能与北美社会科学领域新近出现的一种方法达成共鸣，这一点真是让我喜出望外。

三、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叙事法

在著名的《德性之后》一书中，麦金泰尔探索了现代生活的困境，这一困境源自把道德视为一个独立的范畴，进而将它从科学知识中分离出去。与此相反，在康德提出事实与价值相分的两元论之前，人们却是在知识与美德融为一体的思想框架内来沉思道德。“在一个长期受理性支配的世界里，宗教再也不能为人类的道德话语与实践提供一种共有的背景和基础。与此同时，哲学也无法填补宗教的空白，而哲学之所以会失去核心的文化功能，只得退居边缘变成一门狭隘的学术科目，其中的重要原因正在于此”（MacIntyre, 1984: 50）。这一变化使得社会科学日益受制于对人类社会进行客观的研究，只将注意力放在那些可观察、可测量和可以模式化的东西上，而不是（理解）人类生活的内在意义。

麦金泰尔认为，作为一种方法，叙事不仅可以克服后启蒙时代社会科学的局限，而且能够用来理解内在的主观世界。在他看来，“尤其是对话……以及一般的人类行动”均可以看成是“表现叙事”（enacted narratives），“因为我们是以叙事的方式理解自己的生活，我们生活在叙事中，同时，叙事也是我们理解他人行动的合适方式。在被讲出来之前，故事就已存在”（MacIntyre, 1984: 211）。他继续指出，“叙事的另一点特征是相关性：我不仅可以描述自己，而且总是能够从别人获得这种描述，并向他人询问。这样一来，我就成了他们所讲述的故事的一部分，正如他们也是我的故事的一部分。每个人的

生活叙事都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叙事的组成部分”（MacIntyre, 1984: 218）。

波尔金赫恩（Polkinghorne）曾详细梳理了针对社会科学领域流行的价值中立观点所发起的各种学术挑战。他指出，“韦伯曾主张一种理解的两元论，也就是将个人决定归属于纯粹私人的世俗倾向（private world-orientation），从而与科学主义或工具主义视角得出的理性的主体之间共有的有效信息分离开来”（Polkinghorne, 1988: 41）。他告诉我们，叙事已被广泛地运用于历史、文学以及心理学领域，以便将价值和科学理解重新联为一体。而在我看来，他的这些讨论中最有味的部分莫过于分析叙事在心理学领域扮演的重建角色。他强调人类有能力去“创造一种既连贯又得体的叙事，并由此确认个体当下的境遇”（Polkinghorne, 1988: 106）。

波尔金赫恩接着说道：“在理解人类的存在时，无论这种人类存在是人性经验还是制度化的‘生活’，叙事都可以发挥核心的功能”（Polkinghorne, 1988: 123）。根据人类存在的叙事理论，人们从事研究时，应集中关注人类个体亲身经历并被其解释的活生生的存在（Polkinghorne, 1988: 125）。这样一来，就可以超越长期以来一直在主宰社会科学研究的时间观念，形成一种不同的时间观念。“在由那种正规的启蒙社会科学建构而成的所谓客观现实中，世界只被描绘成由各种毫无意义的物体汇集而成的空间，而线性的时间之翼则将它从过去带到了现在”（Polkinghorne, 1988: 126）。然而在叙事理解中，个人却同时要处理多重的时间维度，他立足现在，但在回忆中他又能身处过去，而憧憬希望则可以让他生活在未来。因此，在叙事研究中，个体或机构往往会被看成是“不断展开的故事”（unfolding story），而不是一个时空固定的实体。不仅如此，叙事研究中的个人还会被认为是有着多重的关系，包括与家庭、同事、机构的关系，当然还有与研究者的关系。

克莱丁宁和康纳利指出，在他们的叙事工作中，“暂时性”（temporality）乃是一个重要的术语。“我们……不仅将生活看成此时

此刻正在经历的事情，而且将其理解为人物、地点与事件组成的连续统一体。正如我们自己的生活植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叙事（larger narrative of social science inquiry）之中，在研究过程中与我们朝夕相处的人物、学校以及教育情景同样也是位于长期的历史叙事之中（Clandinin & Connelly, 2000: 19）。在《叙事探究》第一章的结尾，克莱丁宁和康纳利将他们从事叙事探究时的“工作理念”视为理解经验的基本方式，他们说：“叙事研究乃是研究者与其对象之间在某个地方或许多地方进行的长期合作，是特定情境中的社会交往……简单地讲……叙事探究就是去体验故事，去讲述故事”（Clandinin & Connelly, 2000: 20）。

当我着手描绘中国知名教育家的肖像时，这部叙事著作中有两个重要观点左右了我的思考。第一点是每个人都生活在与他人的交往之中，绝不可以将他们视为独立的个体，而应把他们看成是家庭、某个机构或几个机构、社区和国家的成员。第二点是强调在理解生活历程时要突出时间的流动感。

如前所述，这些知名教育家在现代中国的生活经历有一个突出的特点，终其一生，他们的名字都是和一所大学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的个人叙事便与其所在学府的叙事长时期地交织在一起。对中国学者而言，1978年邓小平实施的改革构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使得他们自1949年革命成功以来第一次有了合适的地点和时间来反思自己的生活故事。同样，他们所在的大学也得以有机会重构它们的故事，几乎每一所中国大学都编写了一部校史（institutional history）。

四、描绘教育家的肖像

毫无疑问，由于篇幅有限，我不可能在本文中将我心目中的教育家的“肖像”都呈现出来，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乃是交待“肖像”的绘制过程，以及我在此过程中学到的教训。在好几年的时间里，每位教育家我至少都访谈过两次，有时是我去中国大陆他们所在的大

学，有时则是他们来香港参观香港教育学院，1997年到2002年，我曾担任该学院院长。访谈是开放的，但我要求他们去反思自己的生活，包括家庭生活、求学经历以及他们一生所作的教育贡献。我还询问他们对于中国教育从1950年初期到1978年改革开放各个发展阶段的想法。除此之外，我还搜集了他们写过的文章和著作，以及他们求学时期所在大学和后来他们所服务的大学的校史。

当我着手依靠这些材料为他们每个人绘制“肖像”时，我十分清楚，我与这些学者的关系将会影响这类“肖像”作品的品质：这些学者的内在自我、言语特征，以及他们的“肖像”与中国官方教育史的基本轮廓存在何种程度的符合或偏离，在多大程度上能被刻画出来，将取决于我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多亲密。在这些学者当中，有好几个人是我非常了解的，而且在一起合作过很长一段时期，而另外几个则不是很熟悉，因此一点也不奇怪，当他们公开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教育观点时，便显得相对谨慎多了。

以著名科学家、第一位重点大学女校长谢希德为例，我在1980年即“文革”结束不久就曾见到她。她当时在沿海城市上海的复旦大学担任副校长，主管对外交流事务。而我则是复旦大学外语系的外籍专家。在那两年里，她作为一名良师益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之间的交往在此后许多年一直没有中断，仍会在许多场合走到一起。在她主持世界银行资助中国高等教育的重大项目期间，她经常要出国，并曾非常友善地答应作为大会主题发言人来加拿大参加我主持的国际会议。所以1999年秋，当我在上海医院与她一起度过两个下午时，她会向我敞开心扉，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教育观点。我很理解，她很高兴能借此机会反思她作为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领域的女性领导人的一生及其意义。现在回想起这些与她共处的经历仍会觉得美好，尽管难免有些伤感。一年多一点时间之后，她去世了。十位教育家，只有她没有看过并评论我描绘的“肖像”。

王承绪先生是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开拓者，1983年我第一次与他在伦敦会面。当时我还是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博士生。几十年前，也

就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便在英国完成了研究生学业，此次是他重新回到这个国家。能够遇见一位功底深厚、知识渊博的中国比较教育学者，对我来说真是难得的机遇，因为那时我正在研究中国教育。为了最大限度地把握好这次学习机会，我邀请他和一位同事到我们舒适的研究生公寓——威廉·古登拿夫楼——的餐厅共进晚餐。我得以了解他之后那些年的工作进展是在 18 年以后，也就是 2001 年春在杭州浙江大学再次遇见他之前。当时我刚被浙江大学聘为顾问教授（advisory professor），我前去履行职责。那段时期，王先生正在主持一些重大项目，包括翻译西方教育经典和当代比较教育论著，以中国辉煌的教育史为中心，主编一套三卷本的世界教育史。得知这些情况时我的心情真可谓是无比欣喜。

李秉德先生是中国西北地区的教育先行者，西北师范大学前任校长，杰出的教学理论家。我们之间的交往可以追溯到 1980 年代末期。1989 年，我启动了一项与中国联合培养博士的计划，西北师范大学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之一。12 年来，李秉德一直在支持这项计划，选送了好几位博士生来加拿大深造，出席在加拿大和中国举行的与该计划相关的学术会议，并在许多场合欢迎我去西北师大访问。我因此渐渐非常熟悉他惟一的儿子，并与他两个女儿见面。他的两位博士生后来成为该项计划的骨干成员，我们在许多研究及教育开发领域展开过合作。正是由于这层密切的关系网，李秉德才会开诚布公地向我讲述他的生活故事以及他对于中国教育发展历程的看法，包括革命剧变的敏感时期。

朱九思教授是武汉华中理工大学的前任校长。华中理工大学在中国高教界享有一流的声望。我与朱九思教授的关系并不是随时间流逝慢慢建立起来的，而是源于 1993 年春一段颇具戏剧性的交往经历，因此与前面两位又有所不同。在与一位年轻学者一起在华中理工大学作研究时，我曾向朱九思提出访问他的请求，以便了解他是怎样在“文革”之后改革华中理工大学，并使它迅速成为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而其他大多数大学却仍在摸索出路。我没想到，原本打算只安排

一到两个小时的访谈最后竟变成了三个下午的会谈，每次会谈均长达三个小时。会谈过程中，朱九思教授向我吐露衷肠，堪称毫无保留，而且叫了一群研究生坐在旁边听他讲话。他不仅讲述了自己的工作理念，那些令他牵肠挂肚、真实感人的细节，而且让我们分享了他自己的传奇政治经历。事实上，在我研究的十位知名教育家当中，他是惟一个曾以大学生的身份参加过革命的人，并在延安抗大工作过好些年。我与朱九思教授延续至今的学术友谊正是从这次难忘的接触开始的。之后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所大学进行讲学、合作研究，并从朱九思教授的杰出“学术实践”（scholarship of practice）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潘懋元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的理论权威，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正是由他建立的。我曾经在许多会议上见过他，也多次听过他的演讲，但这些场合总是过于正式。1997年秋，我去厦门大学访问他。他问我想不想参加他周六晚上在家里为研究生举行的沙龙，我立刻答应了。去了之后，我发现自己很快便被沙龙迷住了。几个小时下来，气氛始终是非常热烈，我记得那次沙龙的主题是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大家一直在互相辩论，一位研究生提出一种观点之后，其他研究生立即会表明自己赞成或反对的立场，就这样，大家对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作了深刻的探讨。

鲁洁是中国教育学领域的第一位女博士生导师，也是中国道德教育研究的权威学者。在联合培养博士的过程中，我们之间也达成了非常好的相互了解。我曾在香港与南京对她进行过两次访谈，分享她的生活经历与情感，她的坦率让我感动。第二次访谈快结束的时候，她给了我一篇手稿，这篇手稿可以让我更进一步了解她对教师角色与职责的理解。手稿的标题是“无悔的选择”，在其中，她从自己的家庭生活经历以及43年的教学生涯出发，阐述了她对教师的看法。

因为场景不同，重点以及发现也不尽相同，所以我与上述每一位教育家的会谈都是独特的，但这些会谈在我看来都非常有价值。前文尚未提到这三位教育家，他们是东北师范大学的王逢贤教授、北京大

学的汪永铨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顾明远教授。与这三位教育家的会谈同样是在特定的场景中进行的，因此我能够从他们的生活和教育贡献中获得许多发现。接下来，我将用更多的篇幅介绍第三位女教育家，她也是十位教育家之一，她就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叶澜教授。

我必须作出的决定之一乃是安排人物“肖像”在本书中的出现顺序。我该按教育领域、地理学意义上的地区，还是根据这些教育家的重要或影响程度，来安排顺序呢？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清楚我应该从中国语境出发，选择一种能被（中国人）接受的方式，即根据年龄大小，来决定先后顺序。根据中国礼仪的要求，我决定按照出生时间对他们进行分类，从最年长的学者写起，一直写到最年轻的学者。这样做最终表明也十分有助于读者的理解，因为这些学者的教育及家庭背景能够反映他们早年求学的时代，以及他们各个事业阶段是怎样与中国政治变迁联系在一起。不仅如此，这样做还可以证明，我是否深入了中国社会语境对于这项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一开始，我就希望十位教育家中能有几位女教育家，但是，在我认识的女性当中只有两个人可以称做“知名教育家”，从而能与先前发现的其他七位男教育家放在一起。再三考虑之后，我决定增加一名相对年轻、充满活力的女教育家。我曾与她在一些场合见过面，知道她在当代中国教育领域的影响正日益深远。但我必须面对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国直到今天仍在坚持对于年龄和级别的尊重，而西方则倾向于看重年轻，并强调性别平等。我应该简单说明一下我为什么希望将这位年轻女教育家包括在内的理由。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位更年长的知名教育家，我认识他主要是通过他的名声，尽管很久以前我曾见过他一次。我原想把他包括在内，但等到我开始这项研究时，他却患了 Alzheimer's disease，不可能对他进行访谈。但是，在上海同僚的帮助下，我访问了他最密切的弟子，并阅读了他的传记。在此过程中，我逐渐了解到，对于我已经开始访谈的那位年轻女教育家来说，他是多么重要的一位导师，因为那

位年轻女教育家经常提到他。本书最后一章即是由此而来，在其中我描绘了这样一幅“肖像”——“她心目中的他”，希望以此不仅可以勾勒一所大学图景：这位老教育家曾在这所大学担任校长，而那位年轻女教育家则在这所大学求学、教书；而且能够再现他的生活故事和教育贡献。事实证明，他的故事对于这位年轻女教育家后来成长为一名学者，并以自己的方式建构一项在全国具有声誉、能够影响中国基础教育改革走向的研究计划，乃是一个关键的影响因素。

下面是最后一点可以拿出来与大家一起分享的收获。在描绘这些知名教育家的“肖像”的过程中，我的体会深深印证了杜维明说过的一句话：“人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孤岛），而是各种关系汇集的中心（溪流）”（Wei-Ming, 1998: 14）。我在描写这十位教育家的生活和教育贡献时，觉得自己必须得去梳理他们求学及工作时期所在大学的历史，讲述他们的家庭和学生的故事。我非常清楚，他们首先会将自己看成是家庭、学校、社会和国家的一名成员，真正让他们牵肠挂肚的乃是在这些关系中他们能作出什么样的奉献。

（周 勇 译）

参考文献：

- Clandinin, J. & Michael Connelly (2000). *Narrative Inquiry: Experience and Stor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Inc.
- de Bary, W. T. (1996) Confucian Education in Premodern Asia, in Tu Wei-Ming (ed). *Confucian Tradition in East Asian Modern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yhoe, R. (1989). *China's Universities and Open Door*. New York: M. E. Sharpe, Toronto: OISE Press.
- Hayhoe, R. (1999). *China's Universities 1895 - 1995: A Century of Cultural Conflict*.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Hayhoe, R. and J. Pan (2001). *Knowledge Across Cultures: A Contribution to*

-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Hayhoe, R. (2004). *Full Circle: A Life with Hong Kong and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Huntington, S. (1993).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in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 Irwin, G. (1986). *Three Lives in Mine*. Toronto: Irwin Publishers.
- MacIntyre, A. (1984).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 Polkinghorne, D. (1988). *Narrative Knowing and the Human Sciences*. Alban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Vogel, E. (1991). *Four Little Dragons: The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ei-Ming, T. (1998). Beyond the Enlightenment Mentality, in Tucker, M. et. al. (eds.) *Confucianism and Ecology: The Interrelation of Heaven, Earth and Huma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ei-Ming, T. (2004). My American Experience: First Impression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Harvard China Review*. Vol. V, No. 1.